

生命的光輝 其實一直都在

「我所知林瑞明教授的二三事」座談會紀錄（下）

| 文學筆記

Notes on Professor Ruiming Lin's Memorial Seminar

| On Notes

國立臺灣文學館首任館長林瑞明（1950-2018）畢生關注臺灣歷史、文學、文化，是臺灣文學研究學科化及體制化的重要推手，更是讓臺灣文學為國際學界關注的開拓者。在學術研究之外，他也是一位充滿浪漫情懷的詩人，新詩、俳句創作成果豐碩。為了紀念、也為了記憶，臺文館和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在 2019 年 6 月 29 日舉辦了「林瑞明教授學術研討會」，當天除有多位學者發表相關論文，我們也邀請林瑞明的知交與門生齊聚一堂，以談諧、感性兼而有之的角度，訴說他／她們所認識的林瑞明。

Image courtesy of 國立臺灣文學館

時間：2019 年 6 月 29 日，16：30-17：30

地點：國立臺灣文學館 B1 國際會議廳

主辦：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、國立臺灣文學館

主持人：陳萬益（清華大學臺文所退休教授）

與談人：孫大川（監察院副院長）、許雪姬（中研院臺史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）、

楊翠（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）、杉森藍（實踐大學應用日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）

記錄：陳淑容（中研院臺史所博士級專案研究員）

整理：趙慶華（國立臺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）



杉森藍：這棵老樹就是老師，讓今天我們能夠聚在一起。

杉森藍：看到今天座談會的陣容，一方面感到非常榮幸，一方面也很惶恐，應該很多位學長姊更適合上臺，但後來想一想，可能因為我是「阿本仔」的關係。老師曾經跟我說過：「愛將，你可能在臺灣比較容易找到工作，因為你是阿本仔！」真的被老師猜到了。我博士班畢業半年後，雖然是約聘，但找到在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教日語的工作，之後跟臺灣人結婚、生子，如果沒有老師的教導與包容就沒有現在的我。

由於大學時期的中文老師許極燉先生的強烈建議，2001 年我來臺灣就讀臺灣文學研究所，成為林老師的學生。不過，碩士班期間我的中文程度不太好，只有課堂上和老師及同門學長姊兩個禮拜一次的聚會時見到面。後來老師當上臺灣文學館館長，公務繁忙，互動更少了。

當我進入歷史系博士班後，跟老師才有比較多的互動。博一時，老師開始洗腎，常聽說他傷口沒有癒合就噴血，有一次我跟安惠學姊親眼目睹：老師的研究室像命案現場一樣，我們趕緊用剛好來臺灣看老師的美智學姊送的花束緞帶綁起來。我們都嚇傻了，原本應該要安慰老師，結果反而是老師安慰我們，他擠出笑聲，說美智又救他一命；因為手上綁著緞帶又開玩笑地說：「我變成禮物了」之類的話。後來我們常常在老師洗完腎後去看他，在歷史系的聯誼室看電視聊天，讀老師新的詩作，偶爾一起去吃飯。這個吃飯時間也是我生命中重要的課程，因為老師會聊到天南地北，讓我們多認識臺灣的人事物。老師經歷了很多不平衡、委屈等等，但他從來不對我們講那些事，也不講別人壞話。接下來我從三個部分來談，老師對日本學界、日籍學生和我的影響。

1 | 「我所知林瑞明教授的二三事」座談會後合影。

2 | 杉森藍。

首先是對日本學界的影響。老師的代表作被翻譯成日文在日本發表，是 1992 年〈現階段臺語文學之發展及其意義〉被收錄在田畑書店《激動の中の臺灣》，這是日本學界對於臺灣文學引介的開始。1993 年岩波書店的《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》一書收錄松永正義老師所譯的〈騷動的靈魂——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〉。1994 年，若林正丈老師所著作的《東洋民主主義》一書中，有一章是〈從南臺灣觀察——與文學史家林瑞明對話〉（南臺灣から見つめる——文学史家林瑞明と語る）。之後，2001 年 3 月，《天理學報》刊載井手勇學長翻譯，林老師在天理臺灣學會發表的演講稿〈民族掙扎的血淚——臺灣文學導言〉（民族の抗いの血と涙 -- 臺灣文学序説）；2008 年《植民地文化研究 資料と分析》上刊載老師的〈日中戦争下の臺灣文壇〉一文，可以看出老師早期對殖民地文學、皇民文學研究受到日本學界的重視。

老師有一首詩〈三溫暖與圖書館——致塚本照和教授〉，可以代表他對日本以及日本研究者想說的話：

三溫暖是極高尚的／場所，您說我們一起／去洗個乾淨的澡／幾回合蒸洗下來／
裡裡外外都清爽了／您沒有武士的殺氣／我不懷無端仇恨／如是談論日據下／
掙扎的臺灣文學／希望逼近了真實／半個世紀的時光／我的父祖兩代／
辛苦的生活過來／傷痕，烙印我的身軀／櫻花先生，您看到了嗎？

我覺得這是老師給日本研究者的一種提醒，希望日本研究者放在心上，尤其詩中所說，父祖兩代的歷史傷痕都烙印在被殖民者身上。

再來我要談的是求學時期對老師的印象。身為老師的學生，大家都知道他常說做研究要「在夾縫中求生存」，選題目的時候必須要有「與自己的生命相呼應的」，廣泛閱讀的重要性，不要只關心你研究的對象，只看到樹不會看到森林。研究寧可量少，不要自我抄襲做研究要腳踏實地，抓住議題，將史料建構起來的史料派作法雖然看起來不時髦，但永遠不會過時。老師強調編年表的重要性，認為可以造福後人，減少後人工作時間。他真的是腳踏實地、默默努力堅持完成很多事情的人。

最後我想要介紹老師的日籍學生。老師的日籍學生，包括我總共有 4 位。第一位是井手勇學長，他寫的是《決戰時期臺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》，目前在日本的天理教服務，老師告別式那一天特地從日本趕來，又匆匆地回去，令人感動。第二位是大原美智學姊，寫了《坂口禔子研究》，老師常提到 1997 年幫美智學姊看論文的時候，一直看不到字，發現眼壓高而住院。後來美智學姊跟安煥然學長結婚，定居馬來西亞，現在南方大學學院擔任日語老師。第三位是松尾直太學長，松尾學長做的是濱田隼雄研究，他可能是跟隨老師最久的學生之一，老師非常肯定學長的研究和研究的態度。目前在實踐大學應用日文學系服務，成為我的同事。

老師平易近人與對學生的真情態度，公平且一視同仁的作為，能夠讓大家看到臺灣文學的真善美，就像他從來不會假惺惺，對任何人都一樣地看待，常常跟我說不要「楞鬼假細義（貪吃裝客氣）」，這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。

最後，跟大家介紹老師詩作〈老樹之歌〉的一段，這是老師祈福孔廟生病的榕樹所寫。

老樹、老樹／你要活下來／老樹、老樹／你要活下來／微細的聲音／我聽見了／
NAMTASTE／我尊重你／那包容宇宙的心／你的心，我的心／把我們連結成一體

我一直覺得這棵老樹就是老師，老師總是包容我們，我們連結成一體，這樣的老樹，讓今天我們能夠聚在一起，讓我有機會與大家分享，非常感謝老師！

陳萬益：他寫的臺南人早、午餐，或是從早到晚的俳句，都帶給我們美好的詩人感受與回憶。

陳萬益：最後我想用一點時間補充我跟林老師的交往。其實我跟林老師的交往，在《奔流：林瑞明教授訪問記錄》〈序〉裡面，大概都有談過。我能為《奔流》寫序感到很榮幸，這是我第二次為他的書寫序，第一篇是他 60 歲的時候，學生為他出版《南風——林梵還曆桃李集》，讓我為他寫序。如果大家看過這本書，就知道林老師當年非常討厭中文系，因為中文系的學生要點「十三經」，我跟許多人都是出身自這樣的中文系，不過還好臺大中文系不用點經書。

我現在可以大聲說，自己和林老師「咱攏是臺南人」。可是當年，在跟他交往比較密切的時候，當我說自己是「臺南人」，都會被他揶揄：「阮府城人」，他這麼一講，來自臺南縣麻豆的我就矮一截了。他確實是不折不扣，對府城的歷史、文化、飲食、生活有相當的感受與融入的「府城人」，跟我這樣一個臺南縣出生的小孩，當然很不一樣。林老師在《奔流》中雖然指出一些他對我的印象，可是最後面又忍不住說：「我



陳萬益。



《南風》。

跟陳萬益有所不同，他的過去如何，而我又怎樣……。」等等，這是因為我念中文系，他念歷史系嗎？可能還有家庭背景的差異。林老師出身的府城家庭，孕育這樣一個詩人、學者，日後在臺灣文學的教學、研究佔有重要位置。中文系的我跟歷史系的他之所以會有交集，某方面來講也很荒唐，我們是從做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開始接線的——我發現他做的是晚清譴責小說研究，而我在那個階段也是研究中國古典小說；後來在清華大學跟胡萬川教授創辦小說戲曲研究中心，開始跟林老師邀稿，請他在專刊發表論文。因為這段機緣，才開始他所說的「我們的90年代」。1989年清華大學成立文學系以後，我跟呂興昌、胡萬川想做臺灣文學，想到這個臺大歷史系出身的臺南一中學弟林瑞明，專程到成大去拜訪他。

在座的吳密察院長其實是臺灣文學館的推動者，包括林老師、陳昌明老師跟我在這個階段，因為與吳院長合作，才使得臺灣文學館的軟硬體開展起來。林老師2003年接下臺灣文學館，是帶著相當強烈的使命感，他認為我們這麼努力推動臺灣文學進入體制，怎麼可以在最後階段功虧一簣？他笑我借調期滿回清華是「落跑」，甚至開玩笑說「要剝我腳筋」，而他就在使命感驅使下承擔了文學館的館長職位，兩年下來，壓力大到幾乎崩潰。幾位當時臺文館「黃埔一期」的人員包括賴香吟等都在現場，大家一定比我更強烈感受到當時林老師的狀況。記得有一天，我們到鄰近海邊吃海鮮，回程路上他想起他的阿嬤而痛哭，我知道他備受壓力所以沒有多說，就把車子停在路邊讓他發洩。現在回想，他在成大歷史系那麼久的時間，幾度推辭應該要做的系主任，但卻義不容辭接受臺文館館長職務，兩年的行政工作讓他累垮了。但是回頭一想，若沒有他在那個階段的努力，臺文館大概就沒辦法成為現在的樣子。

我認為府城出身的林瑞明，勇於肩負臺文館的使命，當然跟他的家庭、父親的影響息息相關。他的父親，其實就是我們戰後世代，也是吳念真電影中的「多桑」。林老師的多桑在戰後當警察，這個身分讓他可以比較沒有後顧之憂地走上他的學習之路；更重要的是，父親帶著他旅遊、訂閱報紙、雜誌、聽音樂這些經驗，使他在中學時候

就成為我們現在所說的「標準文青」，這樣的文青是像我這樣出身臺南縣的臺南人所望塵莫及的。林老師高二時就從臺南一中轉學到建國中學，這對當時的我們而言簡直是不可思議，那時候有幾個家庭的父親，不要說錢的問題，可以容許這樣叛逆的孩子跑到臺北去？去臺北以後，牯嶺街成為他淘寶的地方。我認為林瑞明這樣一個學歷史，又愛文學的文青養成，跟他父親有密切的關聯，特別是在他父親晚年歷經美麗島事件，也讓他比我們更早覺醒，完全不是像我父母親常講的：「你們這個世代就是光復囡仔，讀中國冊大漢，滿腦的反共大陸。」而這樣的意識形態，經過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、再到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，就完全改變。

今天我們談林老師的認同問題，我認為這個變化很正常。林老師早期參與了《夏潮》那樣標準的中國民族主義刊物，到1970年代接觸楊逵、1980年代沉浸在賴和的研究；有這樣的心路歷程，如果不是他的家庭背景和浪漫性格，唸歷史系的人能夠開始臺灣文學的教學跟研究嗎？更不知道我們的體制、我們的臺灣文學館何時才能開始？話雖如此，我在《南風》一書中，看到林老師的學生們跟他的交誼，我想所有跟林老師在一起的人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呵呵大笑或是他躺在成大醫院用iPhone單手打臺灣俳句，還有臺南人早餐、臺南人午餐的時候。即使你沒有那麼幸運，能夠讓他帶著你去吃臺南小吃，但只要早上一起來，看到他在臉書寫的臺南人早、午餐，或是從早到晚的俳句，都可以感受到林老師帶給我們美好的詩人感受與回憶。

在林老師過世半年多後，今天由國立臺灣文學館跟成功大學文學院合辦這場讓大家共聚，重新談述有關林老師的座談會，顯得意義重大。一方面我們遺憾他就這樣離開了，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林老師生命的光輝其實一直存在。

